

外債在經濟轉型中發揮着重大作用，如東歐、拉美的經濟轉型都是在外外部大規模金融援助下實現的。但是，對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而言，再多的外部援助也是杯水車薪。

薪。因此，更有效的手段應當是「國內外援」，而這正是普沃斯基忽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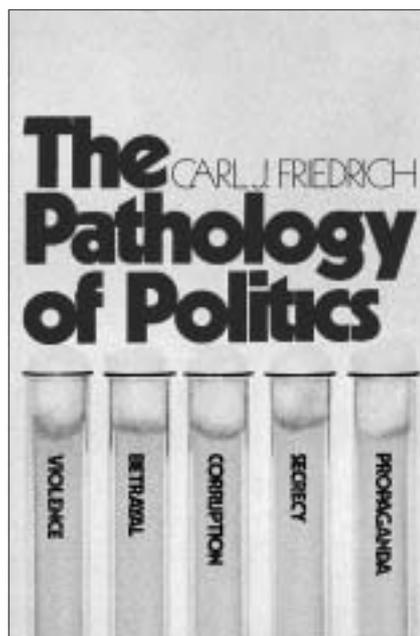
一般看來，需要改革的經濟體內部，是無法自我補償的，但是如果需要在需要改革的舊經濟之外，發展一部分富有活力的新經濟，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特點就是增量改革，「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能夠使效率較高的新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一旁逐步發育、成長起來，就可能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多種經濟成分發展起來之後，居民就業渠道和收入渠道增多，就業結構和收入發生變化，從其他渠道獲得的收入補償了改革的成本。同時，新經濟的示範效應也使人們逐步適應新環境，從而避免過渡時期

的混亂。這樣既給經濟改革爭取了時間，避免了嚴重震蕩，又穩健地發展了市場經濟(樊綱：〈論改革過程〉，載盛洪主編：《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36-64)。

《民主與市場》一書儘管在研究視角上還存在一些偏頗，但仍不失為一本轉型研究的傑作。普沃斯基開闢了轉型研究的新路，他提醒我們關注轉型過程中的行動者因素；他對轉型過程的追蹤分析，顯示了新的政治學分析工具的威力。在國內很多學者依然固守李普塞特、亨廷頓、阿普特(David Apter)、白魯恂(Lucian W. Pye)、林茲(Juan Linz)等傳統研究者的理論時，借鑒一下普沃斯基的研究將是很有意義的。

腐敗及其四個親密夥伴

• 孫傳釗



Carl J. Friedrich, *The Pathology of Politics: Violence, Betrayal, Corruption, Secrecy, and Propagand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為甚麼讀經典》(*Perché leggere i classici*)中，曾這麼說：「一部經典作品不一定教導我們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有時我們在一部經典作品中發現我們已經知道或總以為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卻沒有料到我們所知道的東西是那個經典文本首先說出

來的(或那個想法與那個文本有一種特殊的聯繫)。」(卡爾維諾著，黃燦然、李桂蜜譯：《為甚麼讀經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頁5。)

「腐敗」這個詞在今天中國，可以說人人耳熟能詳，倘若你想研究「腐敗」的話，總得預先讀點先行研究中的經典，免得自大地以為自己又首先提出甚麼最新的見解——這種坐井觀天的自負現象在中國大陸學者中比比皆是。雖然弗爾德里希的《政治的病理學》(Carl J. Friedrich, *The Pathology of Politics: Violence, Betrayal, Corruption, Secrecy, and Propaganda*) 是一部三十五年前問世的政治學著作，但在我眼裏算得上是二十世紀研究「腐敗」的經典，每隔二、三年便總要從圖書館借來翻翻，這也就是卡爾維諾所說的「重讀經典」吧。

中國學術界對弗爾德里希這個名字恐怕還相當陌生，大多數只知道他曾與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合著過《極權主義獨裁統治和專政》(*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書，或者僅讀過他的《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Transcendent Justice: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Constitutionalism*)的中譯本，後者也是中國大陸出版弗爾德里希的唯一著作。其實，他不愧是一個橫跨大西洋的歐美學術界重量級人物，1925年他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即赴美，並一直在哈佛大學任教，戰後在母校海德堡大學兼職，60年代先後擔任過美國政治學會和世界政治學會會長。

從《政治的病理學》那個副標題中，可見「腐敗」有四個親密的夥伴：「暴力」、「背叛」、「秘密主義」和「宣傳」。弗爾德里希把在政治學領域研究人類社會歷史中這五種「疾患的病理」稱為「政治的病理學」的研究。他在序言一開頭提出的問題可能就很吸引中國讀者：腐敗這一疾患為大眾深惡痛絕，無論在民主主義(監督嚴密)，還是威權主義(即使處罰嚴厲)體制下也不能消除，特別在威權主義體制下，即使就數量而言，腐敗還是在發展。那麼人類社會有根除腐敗的可能嗎？像腐敗、暴力等這些明顯的「病理」對政治體制的維持和延續，是不是發揮着明確而重要的功能？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該書對這五種典型病理分門別類地進行歷史考察和分析，圍繞它們對政體維持、延續的功能(促進、鞏固政體)與反功能(阻礙、破壞政體)進行討論。作者不僅站在被統治者的角度，也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所謂國家理性)來分析病理之功能。弗爾德里希說，普通市民對腐敗、暴力等病理的痛恨僅僅是出於道德判斷，依據的是「價值的合理性(wert-rationalität)」；但在進行學理的歷史考察、分析時，還要考慮到韋伯所說的「目的的合理性(zweck-rationalität)」——「國家理性」，後者是不顧及倫理、宗教等價值，把能否達到目的作為一切的評判標準。

學者高全喜讀了弗爾德里希的另一著作《立憲政府與民主》(*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urope and America*)後，在其讀書

從《政治的病理學》那個副標題中，可見「腐敗」有四個親密的夥伴：「暴力」、「背叛」、「秘密主義」和「宣傳」。弗爾德里希把在政治學領域研究人類社會歷史中這五種「疾患的病理」稱為「政治的病理學」的研究。

60、70年代弗爾德里希在研究政治學時夾雜思想史的敘述，同時成熟地使用社會史、制度史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是80年代以後社科、人文研究領域普遍運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先驅。

筆記中也注意到這個論題。然而，《政治的病理學》一書並不是不涉及倫理、宗教等價值，而是另外專門就一個角度，通過這五種病態的政治手段對實現目的達到的效果——功能與反功能的正反兩方面歷史事例，來分析非合理的國家理性那一部分所以能延續下去的各種原因。在作者更早的著作《超驗正義》中，他也表現出對憲法功能研究的熱情，這反映了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的社會功能學派60、70年代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巨大影響力。最近出版的中譯本《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的作者斯科特 (James C. Scott)，也曾著有《比較政治腐敗》(*Comparative Political Corruption*)，論及英國歷史上與現代發展中國家的腐敗根源，及其對政體的功能與反功能問題，在在說明這個議題的生命力。

霍布斯鮑姆 (Eric J. Hobsbawm) 曾批評阿倫特 (Hannah Arendt) 的《論革命》(*On Revolution*) 等政治學著述的缺點在於：對事實本身沒有興趣；與現實相比，刻意優先追求形而上學的概念和詩意的感覺。弗爾德里希也不滿意阿倫特這種形而上學的傾向，比如在《傳統與權威》(*Tradition and Authority*) 一書中也曾批評、糾正阿倫特在反歷史主義時對希臘、羅馬史的史實認定的錯誤。該書和弗爾德里希的其他著述一樣，能體現出其功力的，還是他擅長的歷史敘述與分析。60、70年代他在研究政治學時夾雜思想史的敘述，同時成熟地使用社會史、制度史的研究方法，比如，他

在論述腐敗時，在單闢一章敘述腐敗實例之前，也從馬基雅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孟德斯鳩 (Montesquieu)、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三人的學說展開，輔以歷史上的實例；可以說，是80年代以後社科、人文研究領域普遍運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先驅。

弗爾德里希雖然分別、逐一詳細敘述、分析這五種病理，但是，在最後的歸結中，他指出，這些政治病理的所有形態和功能都源自社會體制的基礎結構或外界環境，很容易適應變化，與時俱進；此外，這些病理相互依存，互為因果，有相互強化的傾向。他描述了這樣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循環圈：暴力一旦蔓延，就容易引發造反、背叛，因為人們出於恐懼或其他原因，背叛了原先的忠誠。造反、背叛、起義一旦增加，反過來又強化了暴力，因為要對背叛者進行打擊和報復。要避免暴力和造反，於是往往採用金錢收買的腐敗手段，因為這種手法非常奏效；相反，腐敗也往往產生背叛、引起暴力。不用說，前面幾個病理都需要秘密主義來掩護，做壞事的人要在道德領域遮蔽公眾的眼睛。但是遮蓋這種秘密活動，或者為病理現象尋找「正當理由」，就需要宣傳活動這塊基石。

作者雖然肯定有些病理在一定社會狀態下，具有維持體制的功能，但同時強調這種功能即使在當時也只能在限定程度之內生效，超過限度則物極必反。比如，他否定索雷爾 (Georges Sorel) 鼓吹建立在

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暴力論，指出無產階級反抗的暴力增強，來自體制鎮壓的暴力也相應增強，所以暴力的功能(軍隊、警察、市民的反抗)都只能限定在一定範圍內，因為人類社會今天還沒有根除暴力的特效藥。可是有時候，小規模的暴力還是需要的，當要鏟除人類共同認為是邪惡的東西的時候，這樣的戰爭，是對人類共同體發揮它的功能。又如，人類都認識到腐敗的反功能，即使民主國家盡力建立反腐敗的制度，腐敗依然難以根絕；可是倘若企圖根絕腐敗的話，那是烏托邦幻想，只會產生一個極權體制，那麼，帶來的結果是政治秩序陷於危機之中，只能是阿克頓(Lord Acton)的結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在極權主義體制內，這五個孿生毒物，都無功能可言，只存在反功能，因為病理想像所謂的功能遠遠超過限度，因此只會相互強化，甚至進一步惡化。

值得注意的是，弗爾德里希認為在當今的民主社會中，仍然操縱大眾的秘密主義與宣傳活動，要停留在一定限度內發揮功能確實愈來愈困難。雖然如此，這兩個病理依然還是現代社會中最重大的病理現象，因為在擁有出版、言論自由的社會裏，這兩種病理作為暴力和腐敗的代用品繼續發揮其功能——暴力往往通過宣傳法規來行使；秘密主義往往通過一種庸俗的遊戲來掩護收買者。

此外，該書對近年來中國大陸學人熱心參與討論的，諸如腐敗對經濟發展有否促進功能、美國攻打伊拉克行使軍事暴力是否正義、國家機密以及個人隱私的保護與政治真相公開有否矛盾、革命與改良孰優孰劣等問題，都有啟發性論述，我在這裏不掠人之美、不越俎代庖地一一列舉了。希望大家不借助我的二手轉述，親自去讀經典、讀原著。

作者雖然肯定有些病理在一定社會狀態下，具有維持體制的功能，但同時強調這種功能即使在當時也只能在限定程度之內生效，超過限度則物極必反。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7年10月號、11月號

第67期 2007.10.31

- 宗 容 文化本位主義的一種理解：復蘇民族身份意識——以和辻哲郎的中國觀為中心
- 劉晨光 恩典與自然：被賜福的「政治學」？——阿奎那政治思想芻議
- 宋會峰 人的重新發現：現代國家的精神前提
- 王 俊 「儒家社會主義」的歷史語境與局限
- 董國強 戴着思想的枷鎖翩翩起舞：張素華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評介

第68期 2007.11.30

- 孟凡茂 從時間細節考察美國第一次退還庚款的交涉過程
- 李國芳 進城初期中共對國民黨員的認識與處理——以石家莊市為例
- 吳麗萍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紅衛兵
- 李安源 從上海美專到柏林中國美術展——劉海粟與蔡元培交往研究
- 鄧春梅、羅如春 「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何處尋？——評《中國法學向何處去》